

中国的内战

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中国青年出版社

98
K266.07

3

2

中国的内战

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CIVIL WAR

1945-1949

〔美〕胡素珊 著
王海良 金燕 译
胡礼忠 许立冰 校
金光耀 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601309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美)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11

ISBN 7-5006-2519-7

I. 中... II. ①胡... ②王... III. 政治斗争-研究-中国-1945~1949 IV. K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745 号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译出

感谢作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提供中文版版权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7.75 印张 8 插页 41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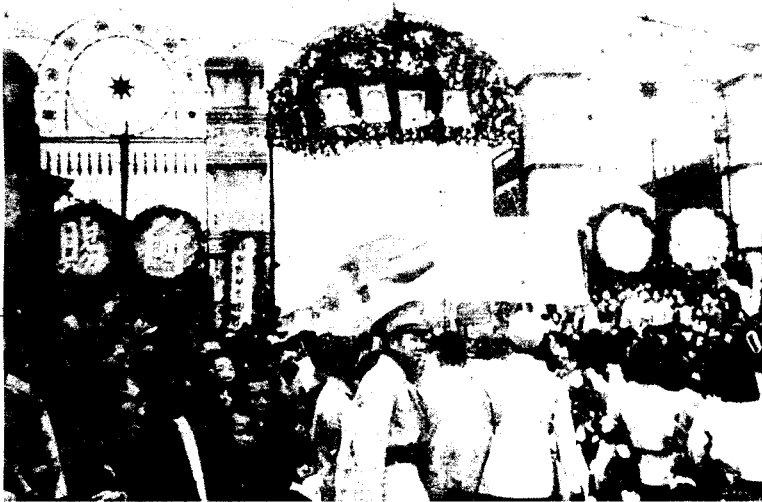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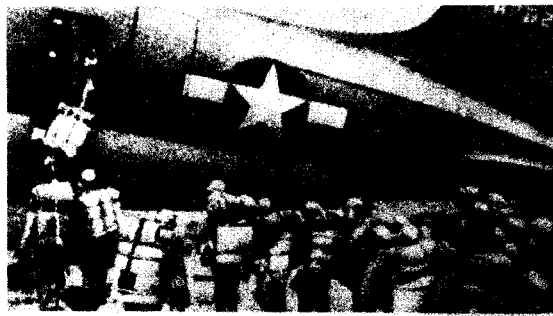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24.00 元(平) 28.00 元(精)



回看20世纪中国译丛

国民党军队由美国军舰运送到
各日占大城市进行接收工作。



昆明师生悼念一二一烈士。



北平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游行路过天安门。



民盟与中共站在一起反对召开“国大”。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勱、王炳南。

觀察
漫畫



作琦王 (刻木) 流洪



又一張!



巧婦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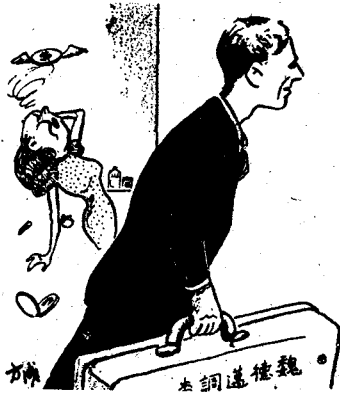
盡蠟殘更



觀察
漫
画



後
支
撐



去
了
！
都
去
了
！



換
上
道
袍



翻身农民支援解放军前线作战。

农民拥护《土地法大纲》。



中國土地法大綱

此法對於農村建設及農村經濟之發展，具有極大之貢獻。其要點如下：
 一、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
 二、貧農、雇農、中農均分土地。
 三、保護農民土地所有權。
 四、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
 五、加強農村基層組織，提高農民覺悟。



晋察冀农民拥护中共的土地改革。

农民分到了土地。





金圆券政策失败后，中国
银行上海分行的柜台
前挤兑的人潮。



在上海火车站前等候撤走
的国民党军官，他们携带
着大量私人物品。

中文本译序

我以浓厚的兴趣读完胡素珊教授(Suzanne Pepper)的专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能够做到这个份儿上,实在不容易。因为对外国学者说来,做这件工作困难太多,难度太大。不但材料找起来非常费劲,而且对能够找到的材料如何从原本上的意思上去把握也是相当不简单的事。它既要克服字义上的误解,还要摆脱思维方式差异上的困扰,以便准确看懂材料进行分析。我十分佩服胡素珊教授执著的研究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本领,能够搜集那么多材料,能够做出那么多细致的比较贴近实际的分析,从而提出那么多对进一步研究这方面问题很有益的结论。

本书中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使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作者考虑这个问题的思路,并没有局限于军事斗争上,而是希图从别的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中去探查。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本书“尝试拓展 1945—1949 年的历史记录,使之包含政治内容,而它使军事斗争对直接相关者而言产生了意义”。但本书“并非展示一部关于政治人物、事件、思想或组织的连贯记录,而是仅限于两大政权争夺者的政策与实践的层面。具体而言它比较、分析了两大对手及其与渴望加以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种思路是对头的。因为国共两大党斗争的结局,是多种社会因素决定的。诚然,共产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毛泽东

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从来没有忽视别的因素，特别是在政治上人心向背因素的消长的影响。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断言“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在这篇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毛泽东言道：蒋介石政府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使自己处于和全国人民为敌的地位，并使全国各阶层人民面临饥饿和死亡，“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这样，蒋介石政府就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其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

胡素珊教授按照自己的思路，依据大量材料，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逐步展开分析，用以说明国民党政府是怎样把曾寄希望于自己的群众抛开的，共产党又是怎样把广大工农和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周围的，论证充分而有说服力。书中不乏有力的材料和精彩的分析，如《反战学潮》一章，说到学生反政府行为受共产党幕后操纵的问题时，作者援引了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多则评论材料，从而指出“共产党干部不应对学生抗议运动负责”。同时，书中还列出有关的民意测验材料。这些材料提示，在学生中只有2.7%至3.7%的人赞成共产党统治全国。作者以此为据，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学生反政府主要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而并非共产党插手的结果。又如在书中的第一部第二章中，作者以大量具体材料展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官员贪污腐化行为和治理混乱情况，然后下结论说：“日本投降后出现的那种本可消除的暂时混乱和管理不善，逐渐成为标志着民众对国民党统治普遍拥护已告终结的开端。”这个判断确有一定道理。从沦陷区大多数人民来说，在八年抗日过程中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对此，我虽然在当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却深有体会。我的父亲及

他的同事都是普通的职员，虽有强烈的爱国心却又没有勇气直接参加反日斗争，只是希望自己的政府有朝一日能打回来。这类人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该说很有代表性。我记得，几乎每天晚上，我的父亲都要用黑色布把窗户遮上，用相当原始的收音机听重庆广播。每听到一个好消息，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也包括开始懂事的“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到抗日胜利，把国民党政府盼回来了。结果，当人们看到接收大员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于是，相当多的人开始不满。在当时，不少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国民党与抗战前大不相同了。其实，研究一下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就会弄明白发生变化的原因。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原本是个很有革命性的现代化政党。它领导民众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功劳确实不小。中华民国建立后，这个党开始消沉，开始退步。鉴于这种情况，孙中山联合刚刚诞生不久的共产党，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重新振作起来，并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装斗争中不断壮大，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不幸的是孙中山过早逝世，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在政治上另有所图，在北伐战争胜利前夕排挤同盟者，独吞胜利果实。蒋介石建立起全国政权之后，成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新军阀。但是，此时的国民党尽管其领导人实施的政策日益为建立和完善法西斯统治服务，而下面的一些党员还是能够保持廉洁的。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内由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恢复起来的上进精神仍有一定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丧失掉。随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先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继而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下才宣布抗战，并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应该说在初期，国民党政府抗战还是积极的努力的。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这个党无法经住长期抗战的考验，在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开始腐化，到抗战后期达到高峰。这就不难说明，为什么那

些真心盼望国民党的人们再见国民党时会大吃一惊，突出地感受到这个党的变化。事实上，国民党既不想也不能“消除暂时混乱和管理不善”，一条道走到黑，把群众都丢光，自己也就“寿终正寝”了。看来，一个政党自身腐败是个不得了的事。再如书中对共产党赢得群众拥护的问题，是通过土改、城市管理、知识分子认识转变等多方面综合论证的。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作者点明：中共“将自己的利益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一致起来，从而创造了一个能够满足它自己对粮食和人力的需求并且拥护反蒋斗争的群众基础”。类似的例子，书中还很多，留给读者去品味。

值得注意的是，胡素珊教授在本书的最后提出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环境”，而中共却能排一切困难而取得胜利呢？书中明确认定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这说明胡素珊教授的认识是很有深度的。特别是在说到整风运动时，作者正确指出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强调“使马列主义适应中国环境以及在党的各级工作中实施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上。可惜，作者没有就此展开论述，也许这不属于本书的任务。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者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政党用一种学说、理论做指导，都要与实际结合，否则就会产生错误，这是个常理。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如果脱离了各个国家无产阶级从事的事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一样的无法起正确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在实际斗争中努力探索结合的途径。后来，毛泽东提出了这一科学的命题，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由于实际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长期历史任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正是这种结合进一步深化的体现。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往往忽视这一点,甚至并不以为然,结果就很难把事情弄明白。能够摆脱西方学者容易犯的毛病,正是胡素珊教授的长处。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十全十美的专著,这样的著作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书中有些观点、议论,我以为仍值得商榷。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报告、文章,在理解上还有不少误差。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前边所指出的,对外国学者说是太难了,恐怕也不能要求过高。胡素珊教授很谦虚,在《中文版自序序》中表示自己的书“系抛砖引玉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并希望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我以为,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书写得很好,翻译也是很有水平的,所以我愿意把它介绍给读者,特别是我的同行们。

张静如

1997.5 于北京师大